

建阳余氏刻书考略（上）

肖东发

建阳书林余氏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刻书世家，在现今所见有关书史和版本学的著作中几乎没有不谈到闽建余氏的刻书，像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就曾说：

夫宋刻书之盛，首推闽中，而闽中尤以建安为最，建安尤以余氏为最。①

其他如陈彬和、查猛济《中国书史》、孙毓修《中国雕版源流考》、钱基博《版本通义》以及台湾学者梁子涵近年在期刊上发表的《建安余氏刻书考》等论著中也都有与此类似的论述。然而，这些论著中普遍存在这么几方面的问题：

1. 对余氏刻书的历史兴衰所述不够清楚，有时甚至还有某些差误。

2. 对余氏所刻书籍的考察不够全面，常仅限于宋元二代，对于明代以后的余氏刻本很少提及。

3. 诸所论述，每多根据各种书目提要转引的二、三手材料，对余氏所刻书籍实物的调查研究不够，因而所述有所局限。

由于这些情况，本文在以往各有关论著的基础上，结合自己平时的学习和调查所得，试图对建阳余氏刻书的历史发展，历朝各代余氏著名的刻书家，他们所刻书籍的品种、数量、特点及其在文化史上的影响等，再做一些综合的历史探讨。

余氏刻书的兴衰

一、余氏刻书始于北宋

1. 清乾隆间对建安余氏刻书情况的考察

余氏刻书的兴衰，二百多年前，清乾隆帝曾派人作过专门调查，此事《大清高宗实录》和《续东华录》均有记载：

乾隆四十年乙未正月丙寅谕军机大臣等：“近日阅米芾墨迹，其纸幅有‘勤有’二字印记，未能悉其来历。及阅内府所藏旧板《千家注杜诗》，向称为宋槧者，卷后有‘皇庆壬子余氏刊於勤有堂’数字。皇庆为元仁宗年号，则其板是元非宋。继阅宋板《古列女传》，书末亦有‘建安余氏靖庵刊于勤有堂’字样；则宋时已有此堂。因考之宋岳珂相台家塾论书板之精者，称建安余仁仲。虽未刊有堂名，可见闽中余板在南宋久已著名。但未知北宋时即行勤有堂名否？又，他书所载明季余氏建板犹盛行，是其世业流传甚久；近日是否相沿？并其家刊书始自何年？及勤有堂名所自？询之闽人之官于朝者，罕知其详。若在本处考查，尚非难事，著传谕钟音于建宁府所属，访查余氏子孙，现在是否尚习刊书之业？并建安余氏自宋以来刊印书板源流，及勤有堂昉于何代何年？今尚存否？或遗迹已无可考，仅存其名？并其家在宋曾否造纸，有无印记之处？或考之志乘，或徵之传闻，逐一查明，遇便复奏。此系考订文墨旧闻，无关政治。钟音宜选派诚妥之员，善为询访，不宜稍涉张皇，尤不得令胥役等借端滋扰。将此随该督奏折之便，谕令知之。”寻奏：“据余氏后人余廷勳等呈出族谱，载其先世自北宋迁建阳县之书林，即以刊书为业，彼时外省板少，余氏独于他处购造纸料，印记“勤有”二字，纸板俱佳，是以建安书籍盛行。至勤有堂名相沿已久，宋理宗时有余文兴号勤有居士，亦系袭旧有堂名为号，今余姓见行绍庆堂书集，即勤有堂故址，其年已不可考。报闻。”②

以上复奏，恐是大略，寥寥数言，语焉不详。乾隆提出的问题并

未全部解决，仍需作进一步考证。但还是回答了余氏刊书是自北宋始。

2. 余氏刻书始于唐代论只是一种推测之说

关于余氏刻书之始，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孙毓修在《中国雕版源流考》中列举宋时建阳的一些书肆后说：

独建安余氏创业于唐，历宋元明未替、为书林之最古者。③

许多谈建本的论著也多沿用此说，其源盖出于《天禄琳琅书目续编》：

是本序后刻“崇化余志安刊于勤有堂。”按宋版《列女传》载“建安余氏靖庵刻于勤有堂”，乃南北朝余祖焕始居闽中，十四世徙建安书林，习其业。二十五世余文兴以旧有勤有堂之名，号勤有居士，盖建安自唐为书肆所萃。④

这一结论的得出，只是由余氏世系的大概推论而来，并无切实的文献依据。

3. 据《余氏宗谱》可知余氏迁居书林在北宋之时

我八二年底在福建建阳进行实地考察期间，先后在建阳县书坊公社书坊大队社员余咸清家、福建省图书馆及福建师大图书馆见到了三部《书林余氏宗谱》。余咸清家的一部是同治年间新安堂刻本，后两部均为抄本，据光绪丙申（1896）余振豪重修本转抄。三个本子内容基本相同。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们不仿从《余氏宗谱》中选录一支，即“书林焕公派、上庠房、书坊文兴公派下世系”（见附录1及图一）来进行考察。

据《书林余氏宗谱》元至正戊戌（1358）刘龄序：

余氏世家由南京扬州府盱眙县泗州下邳郡折居河南汝宁府固始县新安村……、其始祖讳焕公，由先公讳青来令建州建阳后，偕弟讳仲甫公徙居福州古田青杉洋村居焉，是为入闽开基之始祖也。……（传十三世）大亨公生继祖、同祖公，次同祖公宣广西安抚使，任满致政而归，欲

卜山泉禽鱼之乐，以养高年。继崇政，蹈书林，见其真山真水之胜概，又为圣贤过化之邦，于是遂家焉。入书林之始祖也。

宗谱第一世余焕入闽的时间是梁中大通二年庚戌（530）。遗憾的是，《余氏宗谱》中没有明确记载十四世余同祖的生卒年及其在书林定居的年代。但据其曾任广西安抚使之职，便可知其为北宋时人，因广西唐代属岭南道，五代十国时为南汉领地，北宋至道三年（997）分天下为十五路，置广南西路，始有广西之名。^④另外，家谱中最早有生卒年记载的是余同祖曾孙余道顺，生于北宋淳化二年辛卯（991），卒于嘉祐八年癸卯（1063）。据此也可推算出余同祖大约生于十世纪上半叶，其年老退休当在十世纪末、十一世纪初，其时已进入北宋。再则，唐代是我国印刷术发明初期，有关雕版印刷的文献及实物，都告诉我们早期印刷多集中在长江流域（即蜀、吴、越），至今并未见到有唐代福建刻书的记载。因此，我们说余氏定居书林及其开始刻书的时间上限只能是北宋，不可能是唐代。

二、南宋、元代余氏刻书的发展

1、现今所知见的宋元两代余氏刻本

南宋和元代是余氏刻书发展的时期。虽然距今已有六百年以上的历史。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几十种宋元余氏刻本，有的虽无原本传世，但有翻刻本，或有藏书家目录以资考证。经过审订，可知见者为：

刻书处	书 名	刻书年代	行 款	见存或著录
万卷堂 余仁仲	尚书精义五十卷	宋淳熙 庚子 (1180)		张志、瞿目、陆志、四库提要
	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十二卷	绍熙二年 (1191)	十行,十九字,小字双行细黑口、左右双边	北图、图录(见四部丛刊本)
	春秋谷梁经传十二卷	绍熙二年 (1191)	十一行十九字,小字双行、细口,左右双边	莫目、瞿目(见四部丛刊本)
	事物纪原二十六卷	庆元丁巳 (1197)		陆 志
	礼记注二十卷		十一行,十九字,小字双行细黑口,左右双边	北图、上图、图录(见影)
	周礼注十二卷	南宋中期		北图、天禄
	尚书注疏二十卷			傅 目
	纂图互注重言重意周礼十二卷			吴 记
	陆氏易解一卷			邵 注
	尚书全解四十卷			四库提要
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			台 湾	
类编秘府图书画一元龟	南 宋		乙部十五行,廿四、五字,丙丁部十三行,廿五字	日本 汉目
余恭礼	活人事证方二十卷	宋嘉定丙子 (1216)	序二行,十四字,十一行,廿一字	森志、汉目 日 本
明经堂 余唐卿	类证普济本事方十卷后集十卷	宋宝祐癸丑 (1254)	十三行,廿一字	森志、汉目 日 本
余腾夫	张文潜文集十卷	南 宋		北大有嘉靖本跋中提到(见)

(表中省称注释见附录3)

励贤堂 余彦国	新编类要图注本草 四十二卷序例五 卷，目录一卷	宋	十行，十九字	森志、汉目 日本
勤有堂 余志安	太平惠民和济局方 十卷	元大德甲 辰 (1304)		台湾、汉目，杨谱 日本、有朝鲜复元 本
	分类补注李太白集 注二十五卷	至大辛亥 (1311)	十二行，廿字，小 字双行廿六里口， 双边	北图、上图(见) 台湾、中图
	集千家注分类杜工 部诗二十五卷文二 卷	皇庆元年 (1312)	十二行，廿字，小 字双行廿六字，黑 口，双边	北图(见)故宫、 南图 上图、台湾、美国
	书集传辑纂注六卷 又一卷朱子说书 纲领一卷	延祐五年 (1318)	十行，廿字，小字 双行廿四字黑口， 四周双边	北图、北大、故宫 上图
	三辅黄图六卷	致和元年 (1328)	十一行，二十一字， 小字双行、廿一字 四周单边	北图(见)
	孟子通十四卷附孟 子集注通证二卷	元天历间 (1328) 1330—	十一行，廿一字， 小字双行同黑口， 四周双边	张 录
	四书通证六卷	天历二年 (1329)	十三行，廿四字， 小字双行，同，黑 口，四周双边	北 图
	四书通二十六卷	天历二年 (1329)	十一行，十九字， 小字双行，廿一字， 黑口四周双边	北图、上图(见影)
	唐律疏义三十卷纂 例十二卷	至顺壬申 (1332)	十二行，廿一字黑 口，四周双边	北图(见图录影) 汉目
	国朝名臣事略十五 卷	元统三年 (1335)	十三行，廿四字， 小字双行，黑口四 周双栏	北图(见影印本)
	易源奥义一卷	至元二年 (1336)		台湾有影抄本
	易学辩惑一卷	至元二年 (1336)		台湾有影抄本
	汉考证，后汉书考 证六卷	元至正三 年 (1343)		丁 志
	诗童子问二十卷	至正甲申 (1344)	十二行，廿三字， 黑口双边	上图、台湾 汉目、森志，日本
	诗传序一卷	至正四年 (1344)		台 湾
	诗传纲领一卷	至正四年 (1344)		同 上

勤有堂 余志安	书蔡氏传旁通六卷	至正乙酉 (1345)	十三行, 大字廿二 廿五, 黑口有耳	瞿目、张志、森志 台湾(见影)
	仪礼图十七卷、仪 礼旁通图一卷	元	十行, 廿字(缺卷 二、五、七)	故宫、上博 台湾
	新编妇人大全良方 二十四卷辨识修药 物法度一卷	元		北 图
	新刊补注铜人穴针 灸图经五卷		十行, 廿字	森志、汉目
	普济本事方十卷	元		杨志、四库提要
	诗缉三十六卷	元	十行, 廿四字, 细 黑口, 四周双边	上 图
	春秋后传十二卷			邵 注
	洗冤录五卷	元	十六行, 廿六、七 字, 黑口	王 记
	古列女传七卷 续列女传一卷	有清道光 阮福翻雕 本	上图下文, 十五行, 十五字, 黑口双边	森志、天禄、邵注 黄书录、(见丛书 集成本)
	琼琯白玉蟾武夷集 八卷	元	十一行, 廿一字, 黑口, 四周双边	北图(见) 瞿目、丁志
勤德堂	增修互注礼部韵略 五卷	元至正甲 申 (1344)	十一行, 小字双行 廿八字	杨谱、美国会图有 日本翻元刻本(见 影)
	皇元风雅十二卷	元		杨谱(见影)
	广韵五卷	元		杨 志
双桂堂	诗集传名物钞音释 纂辑二十卷	元至正十 一年 (1351)	十二行, 十一字, 黑口, 四周双边	北 图
	书集传六卷	元至正十 一年 (1351)	十三行, 廿三字, 小 字双行, 小黑口, 四 周双边	吉 林
	广韵五卷	元	十三行, 黑口, 四 周双边	北图(见影)
	联新事备诗学大成 三十卷	元皇庆间	十三行	故 宫
余 卓	诚斋先生四六发遗 膏馥十卷	元	十四行, 廿三字, 左右双边	辽宁(见)

2. 勤有堂应是元代著名的书肆

从上表可以看出南宋以万卷堂最为著名，与余仁仲万卷堂同时的还有余唐卿的明经堂，余彦国的励贤堂，以及余恭礼、余腾夫等。

元代的余氏刻书坊有勤有堂、勤德堂、双桂堂及余卓等，其中以余志安的勤有堂刻书最多、影响最大，今天可知见的刻本还有二十六种之多。因此，以往常常用勤有堂概括整个余氏，以为勤有堂历经宋元明三代，或者把勤有堂、万卷堂混为一谈，相沿成说，甚至编入工具书供人查检，以讹传讹，至今犹行。例如《仪顾堂续跋》中就出现了“余仁仲刊于勤有堂”一类的错误。^⑥《室名别号索引》中“勤有堂”也注为“宋建安余仁仲”，^⑦实为“元建安余志安”。

历经宋元明三代刻书的是整个建阳余氏，勤有堂只是其中的一个分肆，所刻书集中在元代。至今尚未见到有宋、明两代的勤有堂刻本。而以往各家所著录的“宋勤有堂本”、“明勤有堂本”可以说没有一部经得起推敲。

例一、《千家注杜工部诗二十五卷》、乾隆四十年上谕中已作了订正，该书卷后明明有“皇庆壬子余氏刊于勤有堂”刊记，皇庆是元仁宗年号，居然也“向称宋槧”。^⑧

例二、《古列女传八卷》、也一向被称为宋本。仅卷首有嘉祐八年（1063）王回序，《中国版画史》因此把该书定为嘉祐八年余氏勤有堂刻本^⑨。这种以序断年的方法实在不足为训。该书目录后有外方内圆木印记，中刻草书“建安余氏”；卷二、卷三后有“静庵余氏模刻”一行；卷五后有“余氏勤有堂刊”一行；卷八后有墨地白文本记“建安余氏模刻”一行。在阮福仿刻本中，书后有嘉庆二十五年江藩题跋：

列女传八卷，宋建安余氏所刻。余氏名仁仲，曾刊注疏、何义门学士所谓万卷堂本也。卷末有余靖庵模刊款，靖庵岂仁仲之号？

一见“建安余氏”四字，就联想为余仁仲，就断定为万卷堂本，这是什么逻辑？难道建安余氏全都名叫仁仲？一个是全称，一个是特称，怎么能划等号？就因为余仁仲万卷堂是宋代有名的刻书家，和余仁仲联上就可以定为宋本，也不管原本上已注明“余氏勤有堂刊”的字样，这在佞宋成风的清代藏书家中是屡见不鲜的。根据原书刊记和《宋元余氏刻本知见录》，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勤有堂的静庵不可能是余仁仲的别号，倒有可能是余志安的别号或室名；《古列女传》不可能是宋万卷堂所刻，而是勤有堂刊。现存的《琼琯白玉蟾武夷集》也有“建安余氏刊于静庵”刊记，丁丙的《善本书室藏书志》和瞿镛的《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均著录为元刊本。北京图书馆藏有一部元建安余氏刻明修本。既然同是余静庵所刻，《古列女传》也是元刻而非宋刻。

例三，《三辅黄图六卷》，《福建版本资料汇编》著录为“宋政和元年（1111）余氏勤有堂本”，此书现存北京图书馆。原书目录后有“致和戊辰夏五余氏勤有堂刊”（图二）行书牌记，“致”字较草，但也不能看成“政”字，而且政和年间无戊辰，致和戊辰为公元1328年，“致”“政”一字之误，相差二百多年。在罗振常、周子美的《善本书常见目录》中也误为“政和戊辰”。^⑩

例四，《贞观政要十卷》。

例五，《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这两部书《福建版本资料汇编》均著为余氏勤有堂明刻本。原书都在北京图书馆。前者目录后有“洪武庚戌仲冬王氏勤有堂刊”双行篆文牌记，（图三）后者序后有“洪武壬戌春庐陵勤有堂刊”长方形阴文本记（图四），均非建安余氏所刻，由此可见，不能一见“勤有堂”字样，就断定为余氏刻本，称“勤有堂”的远不止余氏一家；不能过于相信以往的一些“成说”、“定论”，如有可能，尽量查阅原书，才能避免人云亦云，得出正确结论；“勤有堂”不等于整个建阳余氏，它仅是余氏中之一支，既然没有一部站得住脚的“宋勤有

堂本”或“明勤有堂本”，那么还是《中国版刻图录》的结论对：“勤有堂为元时建阳崇化坊名肆”。^⑩

3 “勤有堂”主人考

“勤有堂”刻书既然是元非宋，那么“宋理宗时有余文兴，号勤有居士，系袭旧有堂名为号”之语就需重新考虑了。因为按《余氏宗谱》和现有“勤有堂”刻本而言，显然余文兴称勤有居士在前，而余志安刊书于后。查遍《宗谱》也找不到余志安。如果他就在书坊文兴公世系的话，很可能就是余文兴之子——余安定之别名。根据有四：

（一）古人常以别号为堂名。余氏本身就有一例，余孟和号双峰，其子余象斗刻书坊即称“双峰堂”，乃明代名肆，余志安以其父余文兴之号为刻书堂名，亦同此理。从经济状况来看，也有相同之处，谱系中一般记载甚简，唯余文兴和余孟和之父余继安二人记载颇详，都买山置地，为子孙刻书打下基础。记谓：

余文兴：庆父之子，位已一，字启一，号勤有居士，生于嘉熙元年丁酉（1237），卒于至大二年己酉（1309）九月二十一日，享寿七十三岁。至皇庆癸丑年十二月二十七午时葬东门湖尾平地掌坑，坐巳向亥。妣詹氏。生子一安定。公买有山一片，坐落东门湖尾地掌平，又名蕉坑，上至高顶，下至田傍，左至熊宅山，右至湖尾村大路为界。^⑫

（二）年代相符。勤有堂余志安所刊书中有明确年代可考的，最早是大德甲辰（1304），最晚是至正乙酉（1345）；余安定的生卒年为南宋德祐元年乙亥（1275），卒于至正七年丁亥（1347）。

（三）“勤有堂”与余安定也有联系。《书蔡氏传辑录纂注六卷》一书成于至大戊申（1308），既有余氏勤有堂延祐戊午（1318）刊本，又有刘氏翠岩精舍至正甲午（1345）刊本，行款均为十一行廿字，小字双行廿四字，黑口，四周双边，刘氏本引用诸书后有“建安后学余安定编校”一行。

(四) 在“勤有堂”刊本中出现余安定之子余资名字。据孙星衍仿刻《唐律疏议》，前释文序后有“至正辛卯十一年重校”一行，又有长方木印记“崇化余志安刊于勤有堂”。疏议序后有草书“至顺壬申五月印”一行，卷终有“考亭书院学生余资编校”一行。余资为余安定之子，勤有居士余文兴之孙。

以上只是一种推测，它的前提是勤有堂主人是在书坊余文兴世系，方能成立。(一)、(三)、(四)三条分别说明勤有堂与余文兴、余安定、余资祖孙三代是有联系的，而第二条则在家谱世系中找出与其相符的位置，书之以供有识者进一步考订。

三、明后期余氏刻书最为兴盛

1. 余氏刻书衰于元末明初说的由来

明朝，特别是万历年间，是余氏刻书鼎盛之时。然而，以往对于这一时期余氏刻本的研究是很不够的，有限的几篇论述余氏刻书的论著，均认为早在元末明初余氏就衰落了。叶德辉《书林清话》卷四：

建安余氏书业，衰于元末明初，继之者叶日增广勤堂，自元至明，刻书最多，亦有得余版而改易其姓名堂记者^⑬

梁子涵的《建安余氏刻书考》在转引这段话后说：

案叶氏之说，极为可信……建安余氏刻书世业，到元末明初之际，根据各家考订，似已逐渐衰微了。^⑭

如果他们所讲的是余氏书业衰微一时，再谈后来的复兴，也符合事实。然而问题在于，他们对明初以后的余氏刻本只字不提，只讲到弘治大火为止，事实并非如他们所说，余氏刻书业到了明代中后期，不但没有衰微，反而大盛。仅书坊文兴公派下世系就有余彰德、余象斗、余泗泉、余应虬、余昌祚、余元熹等（见附录

1) 从事刻书业。与他们同时的还有自新斋的余允锡、余泰恒、余文杰、余良木、余绍崖、余明吾；居仁堂的余应孔、余献可，克勤斋的余碧泉、余明台；怡庆堂的余良进、余苍泉；存庆堂的余立予（余张豹）；永庆堂的余秀峰、余郁生等，仅刻书家就有三十多人，刻本更是不计其数。

事实是这样明白地摆在那里，为什么还会出现余氏刻书衰于元末明初的说法呢？分析原因有三：

其一，只重宋元本，对明末坊刻本历来不屑一顾，甚至见到了明朝余氏自新斋刻本，也怀疑其是否是宋元两朝书林余氏子孙的世业。^⑤

其二，还是受上文所说那种“成说”的影响，把勤有堂看成整个建阳余氏，只看到了勤有堂一家衰于元末，没有看到明代还有几十家余氏书坊，只看到了叶氏广勤堂改版的几种书，没有看到明代余氏刻的几百种书，这真是见木不见林了。

其三，掌握的材料不完整不全面。有的文章只言弘治年间建阳书坊大火，不言其后书坊的恢复与发展。如张贻惠《福建版本在中国文化上之地位》一文，引用《竹间十日话》：

弘治十二年十二月初四日，将乐大火，直至初六，郡署庙学延烧二千余家，建阳书坊街亦于是月火灾，古今书板皆成灰烬，自此麻沙板之书遂绝。

这一记载后，遂得出“福建印书事业乃入于衰落时期矣”^⑥的结论。实际上，书坊的刻书业几年后就得以复兴。据《嘉靖建阳县志》载，弘治十六年（1503），广东番禺人区某来建阳任知县，他“雅重斯文，垂情典籍，书林古典缺版悉令重刊，嘉惠四方”^⑦。正德十一年（1516）上任的知县邵幽一面鼓励生产，一面“清稽版籍”^⑧。嘉靖二年的建阳知县项锡：“勤校典籍，以惠四方”^⑨。以上记载，难免有溢美之词，但这部县志所列的“书坊 书目”多

达451种，其中还有关于书市的记载，足以说明到了嘉靖年间，书坊已恢复了昔日的繁荣。

2、实际衰落的仅是勤有堂一家

据现有材料分析，在元朝中叶盛极一时的余氏勤有堂，到了元末明初确实消声匿迹了。一些书版转让给叶氏广勤堂，甚至后来还传到远在金台北京的汪谅手中。《天禄琳琅书目》卷六元版集部共收四部《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集》其中第二部写道：

此书即前板（指余氏勤有堂版），惟将传序碑铭后建安余氏篆书木记剗去，别刊广勤书堂新刊木记。门类目录后钟式炉式二木记尚存，而以皇庆壬子易刊三峰书舍，勤有堂易刊广勤堂。其诗题目录后别将所刊之皇庆壬子余志安刊于勤有堂十二字，虽亦铲去，而卷二十五后所刊者，当时竟未检及，失于削补。所增附之文集二卷，抚印草草，较之前二十五卷亦不相类，此拙工所为，虽欲作伪，安能自掩也耶。

又见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二十四：

《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二十五卷》明汪谅翻元刊本，一为建安余氏勤有堂刊，目录后有皇庆壬子钟式木印，勤有堂鼎式木印；一为广勤书堂新刊，有三峰书舍钟式木印，广勤堂鼎式木印。又有至正戊子潘屏山刊于圭山书院者。此为汪谅所翻，行款字数与元刊无异，惟笔划稍肥耳。刷印用明时官牒残纸，颇多古趣。汪谅乃金台书估，柯氏《史记》，张氏《文选》，皆其所刻者。

余氏有许多分肆，勤有堂一家衰落，不等于整个余氏刻书业都衰落，与勤有堂同时的勤德堂、双桂书堂，到了明代仍在刻书。一部朝鲜复明余氏勤德堂本《续古摘奇算法》目前在台湾。四川省图书馆和美国国会图书馆各有一部《周易传义大全二十四卷图说一卷纲领一卷》，纲领末页下刻“弘治丙辰余氏双桂堂新刊”牌记，（图五）弘治丙辰为1496年；浙江金华图书馆存明嘉靖八年（1529）双桂堂的《四书集注大全三十六卷》，上距刻

《诗集传名物钞音释纂辑》的至正十一年（1351），已近二百年。据张秀民先生考证，双桂堂还曾刻过余象斗编的《三台诗林正宗》^⑩，这已到万历中后期，即十七世纪初了。可见一个书堂延续几朝几百年的例子是不少的，但有版本可证的不是勤有堂，而是双桂堂和勤德堂。

3、余氏刻书在嘉靖时的复兴和万历时的大盛

应该承认，和宋万卷堂、元勤有堂时代相比，明朝前期余氏刻书业是不景气的，分肆不多，刻书种类也少。这与当时社会状况及余氏自家的经济状况也有直接关系。到了嘉靖年间，余氏又广置田产，开始大规模地刻书藏版了。这在《书林余氏家谱》中也可找出线索。还以余文兴一系为例，在三十二世“余继安”下有这样一段记载：

文公长子，位丁一，字履泰，生于弘治壬子（1492），卒于嘉靖壬戌（1562），享年七十一。生子四：仲明（余彰德父）、孟和（余象斗父）昇郎、定郎。公于嘉靖己丑年向阮姓买有山一片，坐落东门书市人和社，上至高岗后刘宅山，下至大路，左至山路，右至郑张二姓山为界。公游览其间，睹山水之气清，慕圣贤之过化，遂于嘉靖癸巳年（1533）建造庵一所，名曰清修寺，以为子孙讲学之所，亦可为印书藏版之地。又买有粮田一百五十余亩，以为子孙读书之资，宾舆之费，拨出粮田五十余亩，以为本寺养僧供佛之具。则洒扫清庙有人，而子弟得以专心致志于诗书之中也。自记。公歿，葬公于寺之后，子孙公议，本房派下得以扞葬。异房异姓欲售一穴，万不能也。又记。

读了上述记载，我们对于万历年间萃庆堂、三台馆等余氏刻书的大盛，余象斗、余昌祚等自己也能编著图书，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四、余氏刻书衰于清初

余氏刻业究竟衰于何时呢？衰于清初。以往的学者很少谈及清朝的建刻、余刻，似乎清朝建阳刻书活动已经绝迹。可是今天

我们仍能见到几部余氏清刻本，如：

（一）《陈眉公先生选注左传龙骧四卷》清初余氏三台馆刻本《中国古籍善本目录》著录，现存吉林大学图书馆。

（二）《精绣通俗全像梁武帝西来演义十卷》孙楷弟《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著录为清初余氏永庆堂刻本。现存日本宫内省图书寮、帝国大学图书馆。我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也见到一部，原题“天花藏主人新编、永庆堂余郁生梓”，卷首有康熙癸丑（1673）天花藏主人序。（图六）

（三）《汉魏名文乘一百十四卷》福建省邵武县图书馆定为“明嘉靖壬午（1522）闽书林张运泰、余元熹刊行”根据就是全书总序后《选例》篇作者张运泰名上有“壬午孟夏日”五字，另据六十三卷《盐铁论》卷首“云间张之象序”顶部注明是“嘉靖癸丑闰三月朔旦”，于是得出结论：该书是从嘉靖元年（1522）到嘉靖三十二年（1553）按年序有计划编排印刷的。以上错误又是以序断年而且把两个序合成一个年号。殊不知该书第二十七卷《东汉文·论衡》是黄道周作的序，黄道周的生卒年为1585—1646，是晚明时著名抗清人物。再阅《余氏家谱》余元熹是余彰德之曾孙，第三十七世，其曾祖尚为万历时人，曾孙怎会在嘉靖年刻书？还有就是版本风格也根本不象嘉靖本，分明是清初印本。所以总序之壬午当为康熙四十一年即1702年。

康熙年间的《建阳县志·艺文志》中有二部书目，其中“著书书目”载书二百余种，存版仅十余种；“梓书书目”载书近一百五十种，存版不过百种。康熙末年，著名学者朱彝尊、查慎行均到过福建，朱彝尊《曝书亭集》中有诗一首云：“得观云谷山头水，恣读麻沙坊里书。”查慎行《敬业堂集》中有《建阳棹歌》一首，云：“西江估客建阳来，不载兰花与药材；妆点溪山真不俗，麻沙坊里贩书回。”可见，此时麻沙一带仍有刻书活动，不过规模已十分有限。清代王士禛在《居易录》中说：“今

则金陵、苏杭书坊刻版流行，建本已不复过岭。”这也说明：到了清代，全国最大的刻书中心已移到南京、苏州、杭州一带，福建建阳及余氏刻书业日趋衰落，但是衰而未竭，可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注释：

①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二第46—47页。

②⑧王先谦《续东华录》乾隆八十一卷第2页。

《清高宗实录》卷九七五第3—5页。

③孙毓修《中国雕版源流考》第27页。

④彭元瑞《天禄琳琅书目续编》卷二第20—21页。

⑤《宋史》卷八十五《地理志》第2094页（标点本）。

⑥陆心源《仪顾堂续跋》卷一第15页。

⑦陈乃乾《室名别号索引》第241页。

⑨王伯敏《中国版画史》第30页。

⑩罗振常、周子美《善本书常见目录》第60页。

⑪北京图书馆《中国版刻图录》第61页。

⑫《书林余氏宗谱》书坊文兴公派下世系第2页。

⑬叶德辉《书林清话》卷四第111页。

⑭梁子涵《建安余氏刻书考》，见《福建文献》（台北）第一卷第一期54页。

⑮见上注第73页。

⑯张貽惠《福建版本在中国文化上的地位》，见《福建文化》第一卷第七期第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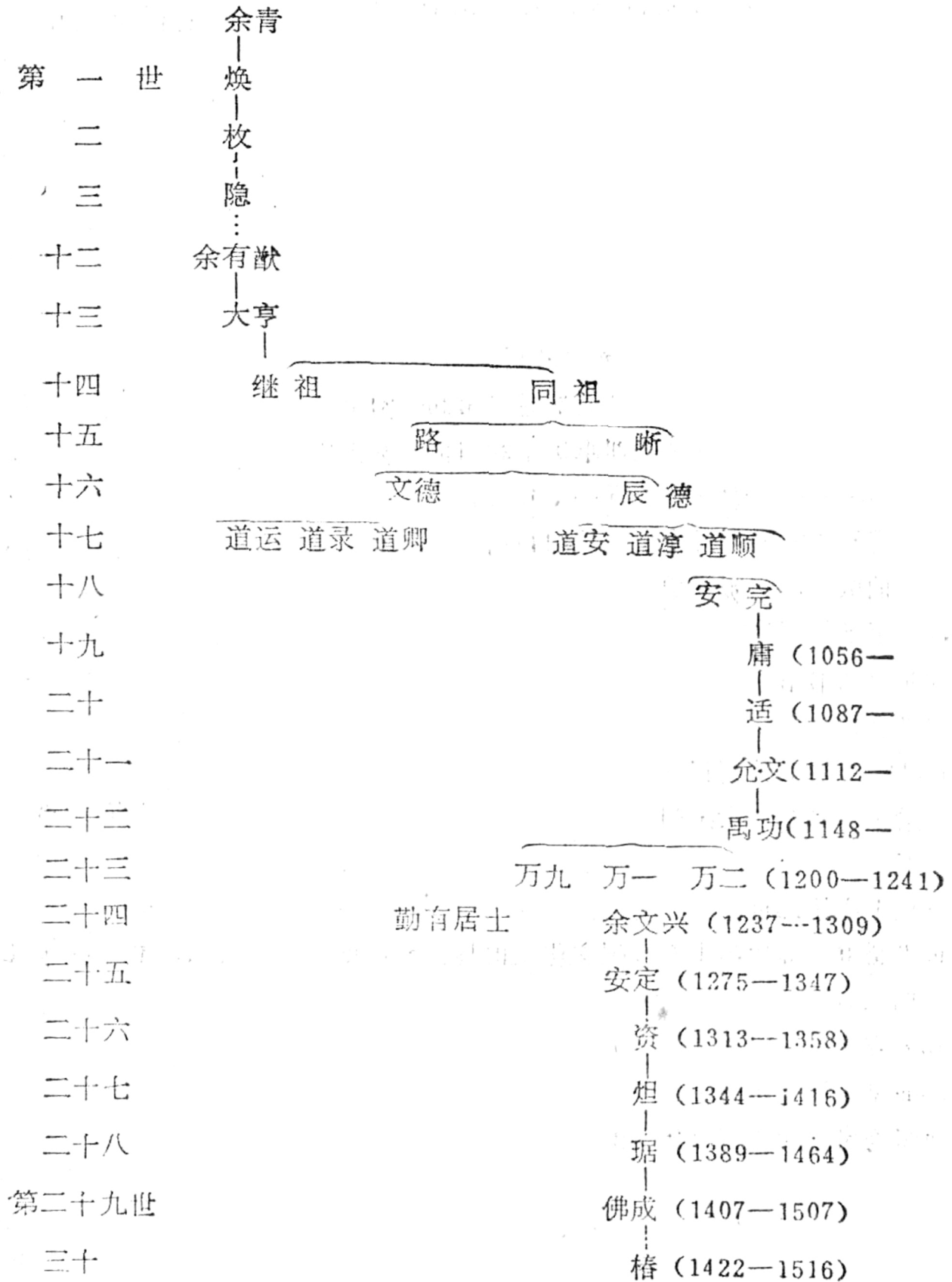
⑰《嘉靖建阳县志》卷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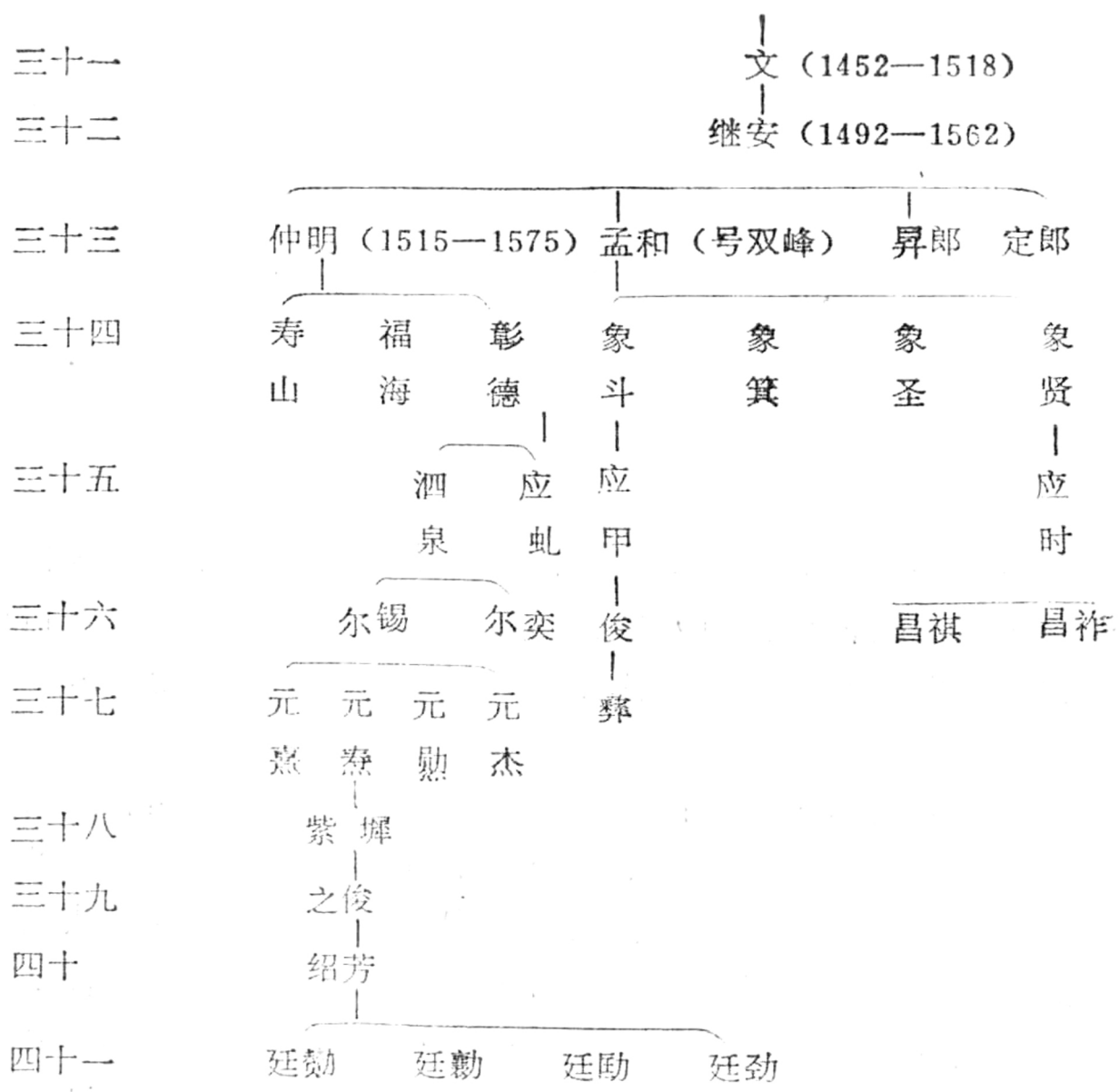
⑱⑲见上注卷十五。

⑳张秀民《明代刻书最多的建宁书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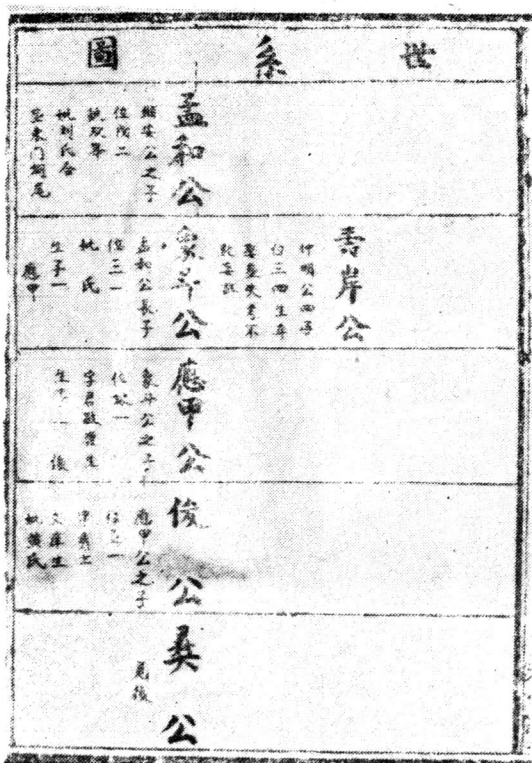
附录1：书林余氏宗谱表

(焕公派上庠房书坊文兴公派下世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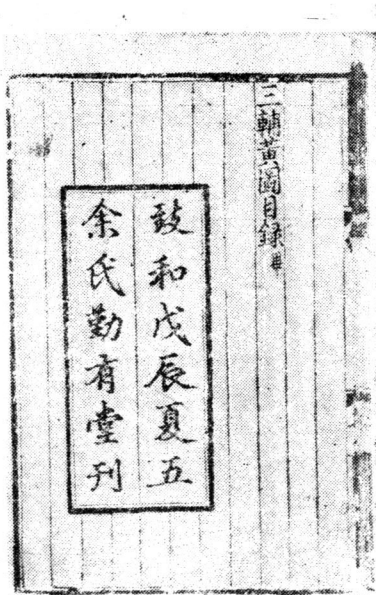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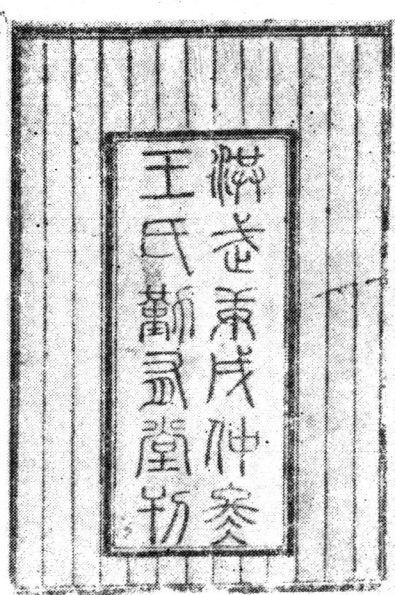
选录自福建省图书馆藏《书林余氏重修宗谱》（清）余振豪等修
 光绪二十二年（1869）新安堂刊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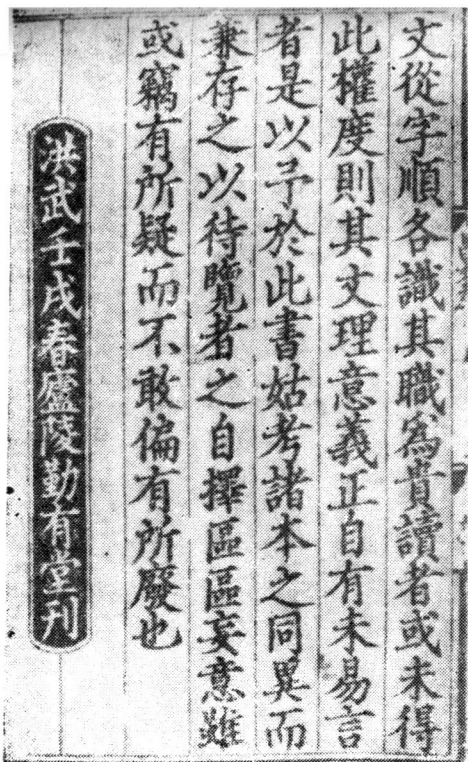
(图一)



(图二)



(图三)



(图四)



(图五)



(图六)